

桂林抗战

文化研究

文集(三)

曾有云

魏华龄

主编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三）

桂林市政府文化研究中心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 编

主编 魏华龄 曾有云
副主编 刘春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9月

(桂)新登字04号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三)

桂林市政府文化研究中心 编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沈 明 吴有名

装帧：荒 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625 插页：2 字数：418千字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800册

ISBN 7—5633—2075—X/G·1612

定价：19.50元

目 录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开卷的话 魏华龄 (1)

桂林抗战文学的特色 杨益群 (6)

论桂林抗战文化的国际性 曹裕文 (24)

浅论抗战时期桂林国际文化大交流 刘寿保 (42)

论桂林抗战时期国际文化的特性 刘寿保 (63)

来自东南亚的抗日呼声

——浅议旅桂作家高平的报告

文学对桂林抗战文化的贡献

..... 郑 芳 (82)

秦似抗战时期反法西斯的战斗杂文 林志仪 (88)

鹿地亘和《三兄弟》 中 辰 (105)

桂林文化城成因初探 李建平 (114)

试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及其特征

——并与李建平等同志商榷 魏华龄 (133)

爱国主义——桂林文化城团结抗

战的旗帜 韦文华 (151)

论党的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 邓有铭 (162)

论抗战期间的桂林文化

——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思考与评价

..... 吴定宇 (175)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及其对广西的影响

..... 李白凤 (182)

论桂林抗战木刻运动

..... 左超英 (194)

抗战时期广西地方政府文化政策

的形成及其特点 盘福东 (213)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社会科学空前繁荣

原因初探 魏华龄 (227)

论桂林文化城的阿Q典型观

——兼评当代几种阿Q典型论 刘泰隆 (242)

《救亡日极》的宣传艺术

..... 高 宁 (254)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日报》

..... 陆君田 (283)

桂林文化城的出版事业在我国近

现代出版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王 劲 (288)

试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文化城

出版事业的领导 龙 谦 (297)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实学书局的

工作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李梅甫 (311)

抗战时期的桂林印刷业

..... 胡庆嘉 (319)

继承和发扬西南剧展的优良传统

——纪念西南剧展50周年 魏华龄 (334)

桂林文化城的一面爱国主义旗帜

——纪念西南剧展50周年	蔡定国	(345)
诗情·画意·歌声：《秋声赋》的艺术		
魅力	黄绍清	(355)
《秋声赋》特色初探	蔡定国	(365)
歌剧《军民进行曲》在桂演出及 意义	左超英	(379)
李文钊与西南剧展	唐国英	(387)
郭老战斗生活的一个缩影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桂林的活动 及其意义	李建平	(397)
桂剧发展史上的丰碑		
——欧阳予倩改革桂剧的 卓越贡献	丘振声 杨荫亭	(405)
田汉在桂林时期的文学活动与文 学创作	刘 平	(435)
抗战时期夏衍在桂林的文化活动	魏华龄	(470)
《救亡日报》的卓越领导者——夏衍	高 宁	(482)
离乱中的心曲		
——巴金旅桂散文刍议	梁卡琳	(497)
论聂绀弩旅桂期间的杂文创作	巫绍勋 彭安文	(515)
民主战士张志让在桂林的抗日实践	曹裕文	(528)
一位不该被遗忘了的作家		

——评孙陵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
成就 杨益群 (544)

《桂林抗战文学史》序 洁 淇 (556)
祝贺《桂林抗战文学史》的出版 张 炯 (560)
开创桂林文化研究的新时期 林焕平 (563)
我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

——评《桂林抗战文学史》 魏华龄 (566)

《桂林文化城大全·文学卷·小说分卷
一》评介 王 泊 (571)

广西首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

综述 魏华龄 (581)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开卷的话

魏华龄

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于1992年问世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文集会继续出下去，也没有料到这本文集的出版，对促进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起到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7月成立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同年10月在桂林召开了“广西首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专家学者非常踊跃，提供了30多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继续编印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二）》，已于1995年1月出版。1994年得到区内外有志于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热心人的积极努力，又陆续收到不少论文，连同过去一些优秀研究成果，在桂林市人民政府文化研究中心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三）》即可付印，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一至三卷的出版，共收文章120篇，120万字，作者62人，内容涉及桂林抗战文化的概

述，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桂林抗战文化的国际性，对西南剧展的评述，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桂林抗战文化与其他地区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关于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对某些问题的争鸣，关于研究成果的评述等等。也涉及到桂林抗战文化中的新闻、出版、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个领域，反映了80年代到90年代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一至三卷的出版，是这10多年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论文的总汇。更可喜的是自90年代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桂林文化城大全》，这是一个宏伟的出版计划，是集资料和研究性于一体的学术著作，也是桂林文化城的一项基本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桂林抗战文学史》，全书共50万字，是国家和广西“七五”期间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项空白，开创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新时期。

为什么说开创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新时期呢？大家知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起步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那时起到80年代中期，主要是从事桂林抗战文化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同时编辑出版了部分资料汇编。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基本上是资料整理与研究同时进行，各地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论文，但从事研究的人不多，有的已经转行，研究的领域局限于文学艺术方面，研究的深度也很不够。自1993年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和广西首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特别是《桂林文化城大全》、《桂林抗战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文化研

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主要特点是：（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从分散的状态转入到有组织、有领导和比较有计划地在进行；（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从资料的征集整理和各自分散地撰写论文，逐步转入到重点（或重大）课题的研究和专著的撰述；（三）研究的领域也从文学艺术逐步拓宽到整个桂林抗战文化包括社会科学这一新的领域；（四）特别难得的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受到自治区和中共桂林市委领导、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出版单位的重视，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五）更可喜的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而且在逐步扩大，特别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少，桂林地区教育学院还在该院中文系开设了桂林抗战文学选修课，一大批青年人的积极参与，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随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使我们对桂林抗战文化的内涵、研究它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对桂林抗战文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革命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中的地位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对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视和兴趣。除了《桂林抗战文学史》这部专著的出版引起国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好评外（该书已获第三届西部地区教育图书评奖一等奖），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刘泰隆在广西首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重大的贡献，宝贵的经验启示——略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于1993年12月广州召开的“鲁迅研究的新路向”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引起了全国鲁迅研究专家的注意。全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漱渝研究员评说：“这篇论文是开拓鲁迅研究地方史新领

域的第一篇好论文，也是开拓鲁迅研究阶段史新领域的第一篇好论文。”全国鲁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鲁迅研究史家张梦阳评说：“解放前的鲁迅研究在抗战时期的确是高峰，而桂林则是全国鲁迅研究的中心。”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刘泰隆教授正在原有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资料，充实内容，深入研究，着手写一本20余万字的《鲁迅研究的一个高峰——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的学术专著。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引起全国鲁迅研究专家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家的注意和重视。上述两例说明：（一）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是一个无价之宝，是一座文化富矿，急待我们下更大的力气和更多的投入去开采和挖掘、去深入研究，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绝不是差不多了，而是面临着一个新的开端，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绝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局部范围的事，而是一个带有全国性、甚至具有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必须从宏观上去把握、去认识；（三）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绝不能只限于文艺领域，必须从整个文化，也包括社会科学在内，都应加以深入研究；（四）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重头戏”绝不只《桂林抗战文学史》一项，还可以研究和撰写《桂林抗战文化史》、《桂林抗战艺术史》、《桂林抗战小说史》等等；除了《鲁迅研究的一个高峰》专著之外，还可以研究和撰写《出版工作的一个高峰》、《戏剧史上的一个高峰》、《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高峰》、《桂林抗战文化的国际性》等；结合现实来研究，可以写《桂林抗战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等专著。总之，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入研究桂林抗战文化，继承和发扬

它的光荣传统，更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完全同意林焕平教授为《桂林文化城大全》写的《总序》中的一段话：“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它，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如果我们放弃责任，既对不起创造文化城的前辈，也为后代子孙所讥评。”

如果说80年代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主要是征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桂林抗战文化资料；那么，90年代则将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高潮，现在，这个高潮已经到来了，让我们继续努力，继承和发扬桂林抗战文化的光荣传统，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在90年代将涌现更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专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这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1995年4月10日

桂林抗战文学的特色

杨益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①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也决不例外。抗战文学，是反映抗日这个重大政治内容和经济基础，为抗日斗争服务的。桂林抗战文学，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横的方面来看，它不仅同延安和国统区各地的抗战文学相联系，而且同世界反法西斯的文学相联系。从纵的方面来看，它又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在抗日战争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它具有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共同特点。但桂林具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军事、政治地位，加之有着畸形发展的经济，故使桂林抗战文学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成为战时我国的一个文学“特区”。概括起来，其特色突出表现在：

（一）桂林抗战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对外交流的窗口，通过这一窗口，强化了中国大陆同港澳及东南亚各国华侨抗战文学艺术界的联系与合作，成为中国抗战文学与海外华文抗战文学的运输站、联络点。抗战初期，作为我国南大门的

广州，理所当然地成了我国与港澳及海外的交通枢纽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镇。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桂林便立即取代了广州的位置。就我国抗战文学而言，桂林也成了大后方抗战文学、根据地抗战文学、沦陷区抗战文学的总汇，这些不同区域的大陆抗战文学，都凭借着桂林作为窗口，通过港澳，向海外进行辐射和交流。根据地、大后方及沦陷区的书籍和报刊杂志，通过桂林运往香港、南洋一带。而南洋、港澳的出版物，也通过香港运往桂林再发放全国各地。以报纸杂志为例，据记载^②，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星岛日报》、《大光报》、《循环日报》、《工商日报》、《申报》、《星报》、《大众报》、《珠江日报》、《立报》、《中华时报》、《南华早报》、《天文台》、《探海灯》等，七天内便可运到桂林。由桂林航空寄递重庆，当天可到，最迟两三天。由桂林发往衡阳、长沙等地，也是两三天内可寄达。而根据地、大后方出版的书刊报纸，也由桂林运往香港，再转销上海等沦陷区。^③当大陆抗战文艺运动出现难题和挫折时，都得到了香港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协作和保护。如1939年12月，重庆三厅阳翰笙、程步高等曾奉郭沫若之命，经桂林抵达香港，为八路军和三厅募款购买交通工具和国内奇缺的文化用品。夏衍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桂林赴港筹集《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复刊经费。结果均完满而归，使《救亡日报》在桂林得以顺利复刊。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桂林以及其它大后方的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经由桂林撤往香港，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也充实壮大了香港抗战文学队伍的力量，推动香港抗战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于桂林文艺界开展的抗日活动，香港有关部门也极

为关注，积极参与。1939年12月19日广西昆仑关大捷，文协桂林分会发起组织了桂林文艺界、新闻界桂南前线慰问团，香港《珠江日报》特派员抵桂随团奔赴前线慰问。同年底，汪精卫和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整顿纲要》，桂林文艺界迅即掀起了讨汪运动，打响了全国文艺界联合讨汪第一炮。香港文艺界、新闻界紧密配合，遥相呼应，并组团抵桂加入反汪肃奸行列。文协香港分会及《大公报》副刊《文艺》主编杨刚、《立报》副刊、《言林》主编叶灵凤、《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编戴望舒等人发表文章大加挞伐。但各文的重要部分却被香港当局腰斩。为了表达“在港文艺作者拥护抗战国策之笃诚与热意”，他们特将这些被删文章，航寄桂林《救亡日报》，以《香港文艺界声讨文化汉奸专页》，全文连载，《救亡日报》特加了编者按语。这些文章包括：杨刚的《怎样反汉奸文化》、乔木的《彻底地清除这一群》、叶灵凤的《及早回头》、陆丹林的《文化界清洁运动》，施蛰存的《尽我们的本分》、林焕平的《迫切的任务》、黄绳的《奴隶与狗的“文艺”》、冯亦代的《斥责之外》、陈畸的《肃清文化汉奸》、宗珏的《跟行动分不开》、温功义的《罪已的精神》、刘地的《斥和平文艺运动》、黄鲁的《肃清文化汉奸》、思慕的《打“落水狗”》、麦穗的《扑灭毒菌》、戴望舒的《实践我们的运动》、大顿的《挥起驱魔杖》、徐迟的《宣判》、徐秋林的《当心挑拨》、叶灵凤的《再斥所谓“和平救国文艺运动”》等，既是桂港两地文学界联合讨汪的一大盛事，又是香港文学弥足珍贵的史料。

桂林、香港文学交流活动也十分频繁，两地作家、艺术家

联谊会经常召开，剧团、演出队互访宣传演出不断。联合创办文学期刊，如艾青（桂林）和戴望舒（香港）合办诗刊《顶点》，更传为我国出版史上的佳话。对桂林作家的成功作品，文协香港分会也及时组织研讨会，扩大影响。如司马文森的中篇传记文学《记尚仲衣教授》发表后（后易名《天才的悲剧》，由桂林南方出版社出单行本），文协香港分会特地举行专题座谈会，对该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又改为《尚仲衣教授》由香港文生出版社再版，影响颇大。黄药眠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一文，是文协桂林分会于1939年10月讨论“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的总结，桂林《救亡日报》发表后，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便及时全文加以转载，对香港文坛有关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起了一定的指导、促进作用。我国大陆抗战文学，还通过桂林这一窗口，经过香港这一中转站，沟通了我国同南洋各地华文抗战文学的联系和合作，进一步推动海外抗战文学运动的发展。由金山、王莹带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应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邀和资助，集中桂林筹备训练，并由李、白指派林枢上校陪同，于1939年4月离桂抵港，在港演出7场后又开赴西贡、新加坡、仰光等地宣传演出，为期数月，轰动一时，既能很好地向南洋各地华侨宣传抗日，活跃当地抗战文艺运动，“威震海外”，“摄服了敌奸的胆”，^④又为祖国抗日募集了一笔经费，影响深远，深得周恩来同志的赞扬。由司马文森、周钢鸣等倡导发起的文艺通迅运动，旨在实践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培养抗战文学新人。他们还借助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等刊物大力加以推广。文协香港分会迅即响应，于1939年8月成立“文艺通讯部”，制定“文艺

通迅员组织大纲”，并聘请夏衍、司马文森、周钢鸣、林林等人任顾问，积极组织和推行文艺通讯运动。1939年11月，新加坡华文作家铁抗、蓝特、林濠等在桂林的影响下也开展了“马华文艺通讯运动”，发表宣言，制订组织大纲，并主动同桂林、香港取得联系，很快便建立了13个支站，正式登记的通讯员40多名，有力地促进了马华抗战文学运动同祖国抗战文学运动的联系与合作，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使马来亚的现实充分地获得反映，呈献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前”。^⑤桂林《救亡日报》、《文艺生活》、《野草》等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及欧阳予倩、艾芜、司马文森等作家的代表作及文学成就，也常为香港及马华华文报刊所引用或推崇。

桂林在抗战期间，不仅是我国大陆抗战文学同香港及东南亚抗战文学交流合作的窗口、中继站，而且也是香港及东南亚抗战文学的热情支持者和坚强后盾。桂林的报刊杂志，十分注意报道香港及东南亚抗战文学的动态，尤对文协香港分会的一系列活动，如声讨文化汉奸、纪念鲁迅、剧运、讲座等，报道更为及时详尽。还经常刊登这些地区作家的作品和声讨、批判文化汉奸及反动文学观点的文章或社评，大力支持、声援香港及东南亚抗战文学运动。值得指出的是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桂林更成为香港进步作家和文化人的庇护所。当时周恩来同志曾急电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指示：不能留下隐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为使营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还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这样，使被营救脱险的800多名作家、艺术家、文化人及其家属，大